

張鐵君著

中共問題評議

正論出版社印行

[

MB
D231
B
3



著者
張鐵君

中
共
問
題
平
議

正論出版社印行

中共問題平議目錄

張鏡君

- 一 怎樣解決黨派問題
- 二 基本的原因仍是思想
- 三 兩大導師的時代背景
- 四 蘇俄革命與三民主義
- 五 新民主主義在蛻化中
- 六 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矛盾
- 七 機會主義的另一看法
- 八 清共的悲痛事件
- 九 土地革命的理論及其結果

- 十 暴動與盲動的區分
- 十一 立三路線與九一八事變
- 十二 國際主義的認識
- 十三 窮蹙歎悔悟歎
- 十四 光明的一頁
- 十五 軍事行動與軍紀軍令
- 十六 邊區政權與團結統一
- 十七 以邊釵代替偽鈔
- 十八 教育文化政策的獨立
- 十九 鴉片的販運種植
- 二十 解決共黨問題的窮議

中共問題平議

一 怎樣解決黨派問題

中國的所謂黨派問題，其實就祇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簡言之，祇是一個中共問題。這是很顯然的。因為雖然有各黨各派的存在，這些黨派也不一定都有問題。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所謂黨派問題的意思，即是說，中國的各黨各派，是否表裏如一的遵守這大家應該遵守的抗戰建國綱領？是否真正做到了精誠團結而沒有別具動機？對於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究竟是否遵照最高領袖和中央所指示的政略，戰略一致進行其抗敵的工作？如果做到了這些最低限度要求的黨派，當然便沒有什麼問題可言，不過依照上述的要求看來，中國共產黨的言論行動，我們確不能不認為，還有相當問題的。中共之所以發生問題，原因當然非常複雜。然而既已成爲問題，我們便應該平心靜氣的加以研究，覓取一個適當的合理的解決方法，諷罵和仇視的態度，這祇有增加他們前羞怒，激動他們的情緒，適使他們將錯就錯



(南) 張鏡君著

直錯到底。問題非但不能解決，反而使問題擴大。因為中國內部的黨派問題越趨嚴重，就會使我們的敵人越覺有利。於國家民族實際並無裨益。

我以爲中共的言論行動，不論怎樣的錯誤，我們仍應該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大體上着眼，將他們看爲是我們的弟兄，我們的手足，至少也應該看爲是我們的朋友。兄弟朋友有些過失，總要抱着勸善規過的誠意，使他們感化改正或懺悔。否則黨派的關係祇有一天一天的趨於分裂，磨擦而沒有方法使牠改正。

被壓迫者的革命職責，最忌諱的便是內部的糾紛，始終得不到互諒互信的解決。中共近年來的一切行動，犯着列寧所說的左傾幼稚病，自然是無可諱言。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爲我們必須盡力避免以增加內部糾紛的方法，應該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不應該站在黨派的立場，因為中共的黨派成見未免太深，我們若再以另一黨派的見地去糾正他，必定要格格不入。一個黨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因為牠有一種特殊的黨見，換一句話說，就因為牠有一種主義和牠特殊的政綱政策。黨員對於主義，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還有信仰問題，信仰已不限於理智範圍，早已由理智而滲有感情的元素了。以一種黨見而糾正另一種黨見，在思想上便要演成主義的論爭，在行動上，又會釀而成爲黨派間的衝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再加上自尊的黨派性的感情，勢必更陷於分裂或對立，從而釀成殘酷迫民族革命戰線內部的糾

翻。

中國國民黨總算是一個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黨見的革命政黨，牠的容受性較廣闊深遠，牠也確能寬量布公，而不陷於普通政黨的狹隘。牠的主義和政綱政策，根據客觀的條件，也極易使其他政黨接受其主張。即使如此，我仍以爲用國家民族的立場去克服中共的黨見，似乎更爲有力。要使一個獨立的政黨和牠的黨見，自取消而融化合併於一個大黨，在歷史上也並非絕無前例，但決不是可以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潛移默化始有可能。現在有些人主張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這是一個目的，如何真正實現這目的，那還得從多方面盡力。現在中共已經宣言接受三民主義，已經擁護最高領袖，姓不論他們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內容，尙不十分正確，他們所擁護最高領袖的意義，還要使他們出於真誠，我們仍應以君子之心贈人爲善，寬大爲懷，夫然後才能解決黨派問題。

一切政黨不給其黨見怎樣的歧異，時根到底，牠不能不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否則牠便是一個叛國的黨。當國家民族的利益和黨派的利益不相容時，一個愛國的黨，牠必然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主體。一切政黨的黨見與行動，其非非向黨國不能以一個政黨而標準而衡量另一個政黨，然而從國家民族的立場看來，某一黨派的錯誤得失，如果在全國民衆所公認的錯誤，那個政黨便應該真誠反省了。歐洲民

主國家，在不敵國外患的時期，一切政黨往往拋棄自己本身的利益而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就由於一切政黨都是爲了國家民族才組織起來的原故。祇有爲目的而犧牲手段，永不能爲手段而犧牲目的。中共問題的解決，其關鍵就在此，而這個關鍵却在中共本身。我們希望牠對於這一點有澈底的認識。

二 基本的原由仍是思想

中共黨分子，據我看來，除掉那些浮躁，叫聲與狂妄的成分外，一般黨員也有不少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的耐勞忍苦，他們的奮鬥犧牲，他們那種信仰堅定的殉道精神，較之那些動輒卑劣，行爲貪鄙，日爲升官發財是務的腐化分子，我以為後者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真正敵人。中共的黨中既然很多有朝氣，前進的黨員，爲什麼他們過去一切動，總是和國家民族的利益走向相反的方面，甚至陷於類似盜匪的爲呢？基本的原由，仍然是思想問題。

馬克斯主義向來，被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的確，社會主義能夠脫離烏托邦的色彩而成爲一種實際的實踐原則，不能不說是馬克斯的功績。從來一種社會主義，沒有像馬克斯主義這樣約引起思想界的反響，也沒有一種主義會招來這麼多的批評，數十年來馬克斯主義的批評越多，牠的價值也越更爲人重

視。老實說，馬克斯主義並不怕他人批判，牠的戰鬥的本能完全在於這些批判給牠以鍛鍊和充實的機會。所以馬克斯主義的沒落，與其說是受了許多學者的圍攻，毋寧說是由於社會進化的歷程中確實發現了許多與馬克斯預言不合的事實，這些事實竟會使這種謹嚴的一個體系，在盡了牠一定時代的使命以後，便隨着歷史的軌跡而消逝了。

現在的馬克斯主義，已經不是第一國際或第二國際的馬克斯主義，就來說牠已經不是馬克斯的馬克斯主義，牠已變成了列寧的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變成了列寧主義，這不是偶然的演變，牠也有使牠演變的時代和社會背景。馬克斯主義已經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牠的內容早已爲列寧主義所改變了。

有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斯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又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斯主義革命原素的復活，又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向前的發展，無論怎樣解釋，列寧主義之美於馬克斯主義，非常顯然。

現在姑以唯物史觀爲例，唯物史觀的基點是以下層的經濟基礎的變遷，決定上層的法律政治等建築物的變動。一切社會組織，非到牠的全生精力在其組織內更無發展之餘地時，決不更趨頹，這新的此從前更高的生產關係，在牠的物質的生存條件未完全變化於舊社會的母胎以前，決不能產生。所以不是

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的生活，倒是人類的社會的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依唯物史觀說來，第一決定力是社會的生活，而人類的意識却是第二，上層的政治等建築是果，而下層的經濟基礎才是因。但我們檢證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的功，是否基於唯物史觀的原理呢？從列寧的活動和主張看來，他已不自覺將人類的努力提為主體，而社會的經濟基礎反成爲一種次因，他已無形中將唯物史觀的公式打破了。當時俄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他的全生產力在其組織內並沒有發展到更無發展的餘地，何以他的社會組織，竟也能夠被革命顛覆，這就非唯物史觀所能解釋。列寧說，俄國是帝國主義經濟鍊條中最弱的一環，當然生產力必然還有廣大發展的餘地，但沙皇制度之被推翻，對於唯物史觀不也成了一個和竅嗎？何況社會革命的爆發不爆發於生產力更無發展餘地的歐美，而倡爆發於大有發展餘地的俄國？想以單獨國家的經濟環節，已組成世界的經濟的鍊條爲辯護，而說明革命可以從較脆弱的環節衝破，這也沒有什麼效力。因爲那脆弱的環節的殖民他國家何以又不先俄國而被革命衝破呢？越辯護而漏洞越大，總而言之，現在的蘇聯早已不是馬克斯主義而是列寧主義了。

馬克斯主義變成了列寧主義，可證明是受了俄國的時代與社會的發展條件所限，也可以證明馬克斯主義不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可以隨意移植。馬克斯主義祇是有一定的時代或社會的產物，在可以適用

的某一個時代或社會中，無論牠怎樣的被許多學者批判與攻擊，但並不穩定的影響到牠的存在，如若時代與社會已變遷了，無論共產黨怎樣的去羅謬或宣傳，牠仍然要隨着歷史的消滅而逐漸死去，實成與反對終於徒然的。

三 兩大導師的時代背景

共產黨最注意的是歷史的時代背景，一切問題，他們都要用時代背景來做衡量，他們這種科學的態度，我們却很欽佩。雖然如此，惜乎他們有意或無意的總不願將中國的時代背景來衡量他們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一種主義與其他另一種主義，若單從彼此主義的立場相互的來評斷其是否正確，那便不會有什麼結論。若以時代背景來作衡量，一種主義的正確或錯誤，也就容易的看出來了。中國何以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而需要三民主義，這並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對，而是因為三民主義為中國的時代與社會所需要的原故。馬克斯生於一八一八年，死於一八八三年，中山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在一九二五年逝世。馬克斯的時代，雖同在這一百年歷史以內，但馬克斯的時代在中山先生的時代以前，所以這兩個偉大的革命導師所處時代的社會問題，實質上均顯然不同。近百餘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強大民族侵略弱

小民族，統治者壓迫被統治者，資本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歷史。這百年內的社會問題，無論如何複雜，歸根到底要不外民族、政治、經濟三大問題。馬克斯的時代，正處於歐洲尤其英國產業革命浪潮高漲的時代，三大問題，被壓迫者所感到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要算「經濟」一個問題。在中山先生的時代，這三個問題在被壓迫民族尤其在中國不但尚未解決，而且日愈深化的統一起來。要解決某一問題，其他兩個問題便不能不同時解決。這一時期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問題尤為嚴重，所以馬克斯從「經濟」的觀點出發，中山先生却同時把握到民族政治經濟三方面，因而追到三個問題的本體「民生」。故中山先生不從「經濟」而從「民生」的觀點出發，便是爲此。但爲針對中國所處的次殖民地的環境，他特着重於民族革命。

詳細點說，歐洲產業革命以後，於過去擁有廣大土地的地主貴族以及經濟致富的農神大賈以外，又產出一種佔有工廠和機器的工業資本家，和專以出賣勞力向勞動階級，這種階級對立社會的產生，自然便引出馬克斯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中的經濟中心的問題。這時代的經濟問題之嚴重，並不是說政治民族各方面便不成爲問題，一八三七年的英國憲章運動，便是針對那以財產爲根據的選舉而發生的。人民憲章中六條要求，要在廢止此種根據財產權的選舉，運動的重心也即爲了還不平等的經濟，一八四

八年以後，資產階級一天一天的發展而專橫起來，法國的二月革命，共和政府固已成立，但路易布呂的獨立工廠却被資產階級破壞，六月二十三日暴動，勞動者之被殺殺達萬餘人，歐洲各國的政權，亦逐漸被資產階級奪取，種種現象都使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決定的意見得着確證。

在民族方面，一八七一年，歐洲雖然有德國與意國的統一成功，但那時歐洲民族問題，幾乎盡爲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的嚴重所掩蓋，而政治問題表現於馬克斯面前的又多決定於經濟，因而以經濟爲中心的馬克斯主義便產生了。故馬克斯時代，歷史沒有使他接觸到民族問題，尤其沒有使他接觸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問題，後來到了列寧他才深刻的加以注意了。中山先生便不如此。中山先生決定傾覆滿清，建立民國之志，是在一八八五年，這中法戰爭失敗的一年，所以中山先生的思想，是由歐洲帝國主義向弱小民族侵略和國內漢滿民族之不平等問題開始。中法戰爭失敗以後，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愈演愈烈。英國之對於印度，法國之對於安南，而且東方又興起一個後進的日本帝國主義。那時中山先生親見英國之進侵雲南，俄國之佔據伊犁，法國之擾亂安南，日本之吞滅琉球朝鮮，不僅滿洲盡失，甲午以後，台灣更割讓日本，俄國又租借旅順大連，法國強迫借廣州灣，英國更擴充九龍界直至大鵬深圳。六年之間，領土如此喪失，由國外看來，當然上民族問題與經濟的侵略問題，由國內看

來，實在是政治的腐敗問題，因而三大問題到了中山先生時代的中國，已綜合成了一個民族的生存問題了。三民主義之必須同時進行，同時解決，這完全是由於時代的要求所致。

所以將馬克斯時代和中山先生的時代比較下來，馬克斯是處在歐洲產業革命後勞資鬥爭尖銳化的時代，中山先生是處在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弱小民族到白熱化的時代，前者的時代是經濟問題的嚴重過民族政治兩問題，後者時代是民族問題的迫切超過經濟政治兩問題，以歐洲來說，經濟問題不能不先謀解決，以中國來說，在和侵略主義抗戰而解決民族問題的過程中，民族政治和經濟三大問題便不能不同時解決的。

所以我們由時代的背景演變方面看來，若歐美的資產階級仍不改變其剝削的態度，或許馬克斯主義將來要實現於歐美也說不一定。至於工業發達國家以及半殖民地的國家所能實現的必然是三民主義。這是時代的要求如此。中共聲明要爲其徹底實現能奮鬥的三民主義，若是上述的三大問題同時解決的三民主義，而不是如他們現在所認識的分爲三個階段去進行的三民主義，那末這就是正確的認識了。

中共目前還不能這樣的認識，我們也不必過於性急。由動物變爲人類，必然要經過一個「猿人」的過渡形態，一個思想要轉變爲另一思想，無論如何總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我以爲國民黨黨其應該重心的

去爭取已往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使他們向真理前進。聞揚。國父的遺教而令全國民衆普遍的了解，這不是國民黨黨員應負的責任嗎？

四 蘇俄革命與三民主義

主義因時代背景而不同，同時也可因社會環境而不同，故主義絕對不能依其詞義的移植。馬克斯主義是工業極度發達社會的產物，歐美工業先進國家，原是最易於實現馬克斯主義的，何以現在社會革命反而不發於西歐及美國呢？這可以用資產階級施行社會政策的緩和手段來說明。所以馬克斯主義的真正死敵是美國汽車大王的福特主義。假使歐洲的工廠都一福特，馬克斯主義便無從實現了。但還不能否認馬克斯主義是產生於歐美工業極發達的社會。主義是不能移植的，工業先進社會所產生的主義，要移植到工業落後或較不達的社會，結果便必然變質。馬克斯主義在蘇俄之所以要變爲列寧主義，不消說也是如此。

革命前的沙俄工業極其落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俄國還很少工廠和製造廠，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這佔着主要的勢力。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是不易得到真正的發展。農奴制度廢除後，沙俄的工業實

本主義才有相當的發展，從一八六五到一八九〇年，產業工人由七十萬六千增加至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九十年代末葉，在大工廠，製造廠，採鑛工業，鐵路中，全國共增加到二百七十九萬二千人。工業雖然迅速發展，但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所引一八九七年的戶口調查的統計，則經濟農村經濟的變佔人口六分之五，經營大小工業，商業，鐵路，水運，建築業，木材業等的人口祇佔六分之一。這說明沙俄仍然是一個農業的社會，工業當然落後了。所以俄國與中國都是工業落後的國家，不過程度上稍較中國進展而已。在這樣一個社會，來談馬克思主義，要使之不會變質，那才是不可想的事。

中山先生在歷次的演說中，常常說俄國革命理論上雖云馬克思主義，而事實上却云三民主義，這是最深刻的見解。共產黨人即使正確的應用他們的唯物史觀去研究，也可以得到同一的結論。我以爲中國改革者，千萬不可抱着黨派的成見，成見是最易與科學衝突。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雖同是用科學方法所獲得的原理，但原理不能離開時間空間條件，時間空間變動，原理也就會失去其正確性。主義基於科學，但科學却可以改正主義。一種主義之正確與否，應該用科學方法在時間空間的條件下檢驗才能決定的。

俄國革命何，事實上非三民主義呢？

第一、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經濟方面便必然以外債的形態而受工業先進國家的牽絆，要擺脫此種東瀛的革命，其本質即是民族主義。蘇俄革命政權成立後，首先就否認一切外債，於是便引起法美等國的圍攻，東方的倭寇，也乘機打劫，其中因法國的債權特大，尤以法國的攻勢最為兇猛。此次戰爭爆發的後民甚至有以生產工具爲武器者，這就足見民族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形態。而且俄國國內民族成爲羣，除大俄羅斯族外，大多數都受壓迫的民族，但大俄羅斯人祇佔百分之四十三，被壓迫民族却佔百分之五十七，故革命初起時的蘇聯，和滿清末年的中國情形幾乎一致。既受國外各帝國主義的壓迫，國內的各民族也極不平等。列寧一而對於國內的各民族力主一律解放，一面也獲得了帝制主義的聯合壓力而獲得蘇聯民族的獨立。因此，蘇聯的革命成功，理論上是階級鬥爭的勝利，而事實上却是民族主義的勝利。

第二、蘇俄雖雖無階級專政，其實專政者還不是一些知識分子所組織的共產黨？無產階級因文化落後，文盲最多，大多數仍然是一些不知不覺者，知識水準既極低下，當然無執政能力。蘇聯十數年來之加強農工教育，努力於掃除文盲運動，雖不叫做「訓政」，不過是名詞問題。所謂專政，祇是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而言，對於無產階級農人以及人民大眾，仍不能不說是實行民主。關於政權的性質，實

據是採階段的進行方式，列寧主張由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階段，經過加米列夫的工農專政，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加速度的躍進策略，和中山先生不經過保皇黨的君主立憲階段，由君主專制立刻過渡到民主共和的策略，可謂極其類似。可是以俄國落後的經濟的下層基礎，竟有這般進步的上層政治的組織，這難道還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唯物史觀的原理嗎？列寧主義已被蘇聯的社會環境壓迫而走入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了。

第三、尤其是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更逐漸符合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新經濟政策的內容，主要是將重要工業，如鐵路銀行等等，收歸國家管理，對外貿易，亦歸國家壟斷，發展農村合作，組織小農經濟，尤重在歡迎外人投資。種種主張，十九與民生主義發展國家資本的主張相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道：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對於歡迎外資，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即極力主張，實業計劃序言中更謂「權之在俄則在，權之在入則亡」，也正和新經濟政策要在蘇維埃政權規定下才能允許的主張，沒有差異。尤巧合的，要算蘇聯

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與三民主義將兩種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實已趨於一致。這樣看來，列寧主義理論上雖是馬克斯主義，而事實上早已實行三民主義了。

列寧主義之所以要走上三民主義相同的路線，這是爲蘇聯社會落後的環境逼迫，不期然而然所形成的。

我這樣的分析，或許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方面的黨員都不十分同意，因他們祇見其異而未見其同；但立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我以爲當見其同，而不見其異較爲有益。何況列寧主義的本質確是如此，中山先生已先我而這種觀察了。（見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及民生主義二語）爲什麼要證明列寧主義事實上共三民主義，這就是希望中國青年要認清工業落後的國家，祇適於實行三民主義，即蘇聯也未嘗離開了這一事實。

五 新民主主義在統化中

過去論者對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曾經有表示不滿時，認爲他仍然走馬克斯主義在中斷的變種，至少也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混血兒。然而從中共的主張來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比較過去

中共的言論總算有了進步，因他們已逐漸認識中國的時代背景及社會環境。自然這種認識還不十分正確，還需要再進一步，然而比較那些抱着馬克思主義死靈牌的分子在要高明多了。現在向中共，他們已由空想而逐漸轉入現實，已由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而逐漸走近科學領域，由工人無祖國而逐漸知有祖國。雖然他們還正在半途的進行中，還沒有完全除空想的公式或教條，對於這祖國的觀念，也還沒有放在第一位，然而較他們以前選一路線或那一路綫的輕舉妄動，總算是有進步。

新民主主義據他們說來是新三民主義，國民黨黨員當然是不承認的。但是這錯誤，我以為大家對於他們也不必過於深責，因為他們初次接觸三民主義，即使是天才，也絕對不能馬上就認識三民主義的博大精深，何況他們的思想中還殘留着馬克思主義的成見呢？大家想想，對於三民主義，連追隨中山先生多年的國民黨同志，也有些還不能深刻認識，據說當時還有所謂一民主義者或二民主義者，那末，我們又怎麼能夠把深刻的認識去責備一個有成見的共產黨員呢？我以為新民主主義雖然不究新三民主義，同時也必然不是舊馬克思主義，祇要他們不再迷信舊馬克思主義的骸骨，對於民族國家總算是有益的。新民主主義無論如何，總已進到三民主義的一個過程。國民黨員，一致認為是他對於三民主義的曲解，未嘗沒有理由，但共產黨人總堅持着他們是心口如一。做便真是這樣，或許他們不是曲解而原諒不

足，也是理想中的事。不管怎樣，國民黨員要人家不誤會，對於三民主義的詳細解釋，就應該更加倍努力。我們立在國家的立場，各黨各派既一致承認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那末，爲了集中黨性，不但別的主義不應該提出，就是近於三民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名詞，也不應該再來提起。卽三民主義也更不應妄分新舊，因爲這些咬文嚼字的宣傳實未免大擾亂青年的思想了。爲民族國家的利益着想，新民主主義的宣傳，的確是應該停止。試想世界上那一種民主主義還能比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更新呢？不必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也不能將治權與政權分別開來，而且治權和政權也不能達到五權與四權那樣的完備，把蘇聯的新憲法看着就是窮證明。毛澤東的解釋，我以爲都有幾點誤會。

首先他將工業落後國家的中國的革命，認爲要分爲兩步去做，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他以爲中國革命應該一絲不改的走歐洲革命所已走過的歷程，卽由封建必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因而三民主義的革命任務，祇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此種思想，自然太忽視人類思想預防的自覺性了，根據唯物史觀的法則，也仍然說不過去。因自由，必然的認識，落後國家的人，已經認識工業先進國家社會進化的必然法則，他就自由引爲前車之鑒決定或捨或取。若果說我們

殖民地國家已經認識了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人剝削人的制度，難道還要讓這種有害的必然的歷史行程再重複的扮演一次嗎？人類決不會如此愚蠢。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其是誰不懂得此點，誰就會陷於有害民族國家的行爲。

毛先生既錯誤認三民主義在歷史行程上祇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時他又將中國革命錯誤地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這就未免太輕視我們國家民族的獨立性了。

世界革命是以綜合弱小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爲內容的，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雙翼，客觀上並沒有誰爲附屬部份誰爲主體，主體是以各自的革命立場而言。蘇聯視階級革命爲主體而以民族革命爲部份，這可以說得過去。在弱小民族國家的革命立場，便應該以民族革命爲主體，而以階級革命爲部份，才可以說是正確。若果弱小民族國家的政黨，竟主張民族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附屬的部份，那就是自居於尾巴主義之列，未免太看不起自己的祖國了。我們分析現在世界經濟的事實，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營養料，大半仰賴於弱小民族的血液，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剝削還未及對於弱小民族的榨取。有時爲緩和無產階級的反抗，還以弱小民族的血液去改良無產階級的特遇。無產階級因受改良政策的恩惠，革命性反而比較低弱，若果不先使弱小民族革命成功，新舊資產階級主義營養品的來源，

資本主義國家中受其恩惠的無產階級，斷不願加緊他們的階級鬥爭，世界革命也必因而遲滯。毛先生一獨小民族民主主義之所以「新」，由於他無意階級世界革命的尾巴或一部分。我想華民族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

「新三民主義」一名詞即使能夠成立，我以為那不過一指三民主義的發展階段而言。假如以他的政策作標準而判斷新舊，這就全昧於主義與政策的區別。類如主義的內容，可以更為充實豐富的發展，但其原理決不會有所改變，那因時代環境而有變動的叫是政策，政策是可變的手段，主義却是不變的目的。故政策有新舊，而主義便絕無所謂新舊。毛先生偏以主義有新舊，又更以新舊來作真假和革命不革命的前提，這錯誤就未免太大了。其實新的那裏會一切都真，而舊的也未必一切都假，新的固然不一定是革命，當然反革命也不一定便是舊的。禮義廉恥，舊社會的遺物，我不相信蘇聯新社會的公民，大家是無禮無義無廉無恥。所謂托派與汪記漢奸，總算是新的，但他們却都是反革命分子。將新舊和真假聯繫起來，並且和革命反革命相提並論，這又是誤用邏輯。

政策既是時時都有所變動，但不變的主義却不因政策的變動而有真假。例如三民主義若主漲漲論，但那是有條件的，首先要看蘇聯的國策和我們的國策是否始終一致，至少也不極端對相反，否則何有關

題，假使我們的政策因國際形勢的變動而變動，是否三民主義便成爲一種舊的舊的主義呢？

可見新民主主義，即使不是曲解，也可以表現共產對三民主義的認識不足，不過新民主主義的認識，較之共產抗戰前的種種言論，總算有了進步，因爲他們已由背叛三民主義的立場，轉而承認三民主義是今日中國之所必需了。若一再對於三民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真做到意志集中，於國家前途的裨益那處不可小視了。

六 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矛盾

我在前面曉曉的談共產黨思想問題，這由於思想是行動的指導，我們要公正的合理的解決共產問題，對於他們的理想也不能不公正的合理的予以評判。依上面的分析共產的思想自然是有若干的錯誤，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錯誤便絕對不可以改正。共產中實在有不少的優秀分子，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許多都是爲了國家民族，現在他們既已承認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所必需，即使於三民主義的認識尚不十分正確，然而他們也有不少頭腦清醒的人，稍加反省便立刻可以覺悟。至於那些黨員我黨或黨運深的人，祇要他們能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看爲高於黨派的利益，思想覺悟不同，亦未嘗不可以團結一

致。在抵抗日帝國主義侵略的存亡緊要關頭，我們千萬不可所有內在的矛盾。內在有矛盾，那實在是一條死路而不是一條出路，矛盾結果，大家必然同歸於盡。真所謂亡則俱亡，存則俱存，這是國共兩黨以及其他的黨派都應該要時時刻刻的朝夕警惕。在這裏我們反對內在的矛盾，並不是便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馬克斯的時代和環境中內在矛盾的觀點，也許是很正確的。因為這是克服實際階級思想或學說的一種武器。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資本家的專權，與勞動者的痛苦，在在均有不平。實際階級爲着要保持於他們有利的資本主義社會，故積極發揮他們保持現存的狀態，努力要使之安定。但此種使勞動者痛苦日深的世界，勞動者不但不想保存而且還願意早日予以推翻，於是馬克斯內在的矛盾的動的哲學觀點便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了。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那反動的壓迫者，他們都極力的要保持現狀與所謂安寧秩序，另一方面那革命的被壓迫者，他們也都要極力打破現狀與毀滅那舊的安寧秩序，前者要求則在於變動。但怎樣才能動變呢？勢必要有內在的矛盾，由內在矛盾而發生動變，再由動變而將現狀推翻，革命於是便成功了。

所以內在矛盾的哲學，在一定的時代與社會也許是很正確的，不過所謂正確，是要因時因地而施，並不是一切時代或任何社會都可以適用。馬克斯的哲學，是根據階級對立的社會，所以他的矛盾是內在

的。中國的社會並沒有截然的階級分立，中華民族是受壓迫的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勞動者與資產階級都是被壓迫者，兩者的對象都是帝國主義與侵略主義，所以中華民族的矛盾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內在不但沒有了不起的矛盾，而且還需要加強內在的合作，內在愈能合作，則應付外在矛盾的力氣便愈強。我們全國民眾與各黨各派之所以要擁護三民主義為唯一的救國主義，而不認三民主義是國民黨所單獨信仰的主義，便是因為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是基於內在的互助合作而加強外在的矛盾鬥爭，此種觀點，實利於推翻日帝國主義所謂東亞的偽和平秩序，而建立我們東亞各弱小民族的真正和平秩序，這也。抗戰建國綱領的真精神所在，我們萬萬不可忽視。

共產黨過去的行動，平情而論，確實與內在矛盾的思想有關，共產主義的青年，如果不再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教條，公式，便應將中國的社會和時代與馬克斯的矛盾觀點，詳細的加以考慮而再估其價值。

倘若進一步立在純真理的觀點來說，內在矛盾的觀點，也祇是一面的真理。世界上許多事物的關係，矛盾與和諧，鬥爭與互助，分裂與統一，都是相繼而生，相依而存。要矛盾鬥爭便必須和諧互助，也唯有和諧互助，才夠，矛盾鬥爭，沒有離開互助的鬥爭，也沒有離開鬥爭的互助。例如要進一階級鬥爭

共產黨階級與帝國主義階級互助，弱小民族越能團結互助，便越能與帝國主義對立鬥爭。共產黨過去太強調了「盾與鬥爭」，因而也犯了不少的錯誤，這些要深切反省。

至於「內在」與「外在」的區別，也不過是所定的範圍與觀察的方向不同，內與外實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單看一方面也不是對於事物的正確認識。例如立在全國的範圍而言，階級對立，可說是內在的矛盾，但由勞資兩階級相互看來，便可說成外在的矛盾了。甲乙兩民族的鬥爭，固可作為外在的矛盾，但立在全人類的範圍，又可作為內在的矛盾了。所以由外向內而觀察事物，則事物莫不內，由內向外而觀察事物，則事物莫不外，故內在的矛盾一辭，實是一偏之見，借乎過去的中國少數青年，竟不能跳出這種片面的窠臼，甚至有爲之變生而不惜流血者。此種無意識的疑難，真使我們爲國家元氣之損失非常痛惜！

七 階會主義的另一看法

共產黨的思想，上面我們大概的檢討過了，現在我們心平氣和的再來看他們過去的行動究竟如何，要解決這與中國國家民族前途有重大關係的共產黨問題，我想這也是很必要的。

有些人以爲其奮戰，好像要挑起兩方面的惡感，他們以爲既事事過極，也不必再往上追咎了。從前種種，已成過去，以後種種，正好及時努力。話雖如此，我總以爲奮戰中也不一定真負都快樂的，縱然那樣，也可以作爲前車之鑒，古人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末嘗沒有一些道理，檢討過去正所以策勵將來，所以算奮戰有時也爲解決問題之所必需。

在共黨的一筆舊帳上，誠如大公報所說：「中共二十年來的努力，對於國家民族祇是一個負擔」。轉捩共黨之所謂錯誤，原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共黨自己的檢討，一種是其他黨派的批判，兩種看法雖然不同。但前者是共黨內各派彼此攻擊的意見，後者是共黨外各黨對他的批評，然而兩者均失之於懷有成見。所以共黨的行動，在他們眼光中所見到的錯誤，也不一定就是真的錯誤，或許有時反而是正確的。對於共黨行動之是否錯誤，要站在國家民族大公無私的觀點才能確定。由這一種觀點看來，共黨的錯誤自然不少，但也有許多舊案，我們還當爲之平議。例如陳獨秀時代領導下的共產黨，依他們自己的檢討，指責爲機會主義。其價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依他們黨內的反對者看來，固然是「一種錯誤」。但機會主義是一種緩進手段，在要求各黨各派尤其國共兩黨團結一致以完成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機會主義倒不十分影響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對於國家民族最有損害的而是攻擊機會主義者的盲動主義。我們由反機會主

讀者文集中所發表的理由，就可以得到證明。八七會議告黨員書，可算是一篇攻擊機會主義最有力的文字。上面說：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對於那些革命主要問題，如工人問題，土地革命問題，對小資產階級關係的問題，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底關係的問題所依據的立場，實際既與國民黨……一樣，則他當然不能保障共產黨自己獨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務。」

「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共產黨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又說：

「它拋棄中國民族革命中無產階級之領導權。」將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彷彿認爲階級鬥爭底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中央不去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隸屬於政府。」「中央不但沒有變法武裝工人，他反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底不滿意，立刻便自願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每次都是說過火或抹殺，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是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如果這就是機會主義，如果這就是陳獨秀領導的「中共」的錯誤，那末，我們可以說，國民黨民族不

妨有這樣的機會主義和錯誤的存在，我們儘可憐惜它沒有錯誤到底。

我以為陳獨秀及其領導的中央應這種作法，實際還保存中山先生與列寧這兩大導師的精神，還似乎認識中國的時代與社會，他還遵守着越飛的宣言。本來，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中的工人問題，土地問題等等，共產黨應與國民黨的立場趨於一致。共產黨既以個人立場加入國民黨，當然不應階階黨而有獨立的組織。中國內部既需要各階級各民族團結合作的民族運動，就不能不放棄階級鬥爭。陳獨秀的中央採用強制的仲裁，解散工人的武裝，遏阻勞動者行動的幼稚與過火，都不失其為中國革命的比較正確的路線。因為民族革命需要的是階級合作，不可再有內在的矛盾，假使不被那盲動主義者所破壞，中國的黨派便不會發生今日的懸殊問題。國家的人力物力也不致受着這樣大的損害，這原是中山先生與列寧所希望的。

中山先生為什麼對於列寧那樣的稱贊，甚至呼之為革命聖人，因為祇有列寧才能觀察出中國革命的特性，和中國蘇在世界革命的共同使命。所以他才嚴厲的強迫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積極的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

中國革命，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一九二〇年共產黨成立後，他們許多人還以為民族主義不徹底，

衝撞出許多激進的口號。當時的彭三對蔣翁列翁所主持，特許正此種錯誤，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中共這時還否決過第三國際的命令，反對加入，但列寧駁厲指出他們這種左傾幼稚性，他們才放棄以前的偏見，以個人的資格加入活動。可見列寧的目光，的確是很遠大的。他不但接受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與經驗，在蘇聯勇於拋棄那由馬克斯主義原理解成的軍事共產主義，而實行由民生主義原理解成的新經濟政策，他還重視馬克斯主義所輕視的民族革命。他之所以強迫中共分子加入國民黨活動，就是想使東方民族革命與西方階級革命合流而造成世界革命有力的聯合戰線。然後革命勢力得以匯合，始有民十六年後的北伐勝利。不幸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又相繼逝世於北平，這東西兩大巨星的隕落，革命失去正確的領導，於是共黨的盲動才開始了。

列寧逝世以後，共黨的左傾幼稚病，又乘時復發。他們在國民黨內，完全忘記了國民革命，在革命勢力發展的過程中，陰謀篡竊黨權。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體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而共黨佔了很大的數量，操縱益烈。故共黨此時的行動，才真正成為機會主義。國民黨員眼見他們系統的陰謀，自然是憤憤不平，於是黨內反共的情緒，日益濃厚，搗毀醜聞，遂於民國十六年爆發了清黨運動。

八 清黨的悲痛事件

共產黨竊取國民黨黨權，在列寧未逝世時，即已暗中活躍，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委被選舉的共產黨員，已有譚平山、李大劍、林祖涵、韓德符、毛澤東、張國燾、王方澍、羅秋白等。且譚平山被推為總務部長，林祖涵被推為農民部長，工人部長雖為羅仲觀，但其實際負責的秘書却為共產黨所被。至於各下級黨部的組織與指導權，亦多操之於共產黨的手中，當時軍隊學校的代表十之八九均共產黨分子。中山先生與列寧先後逝世，對於中蘇兩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和前途，不僅為共產黨的青年疑難，甚至所不能深辯認識，即第三國際的多數負責人也不知列寧的深意所在。他們不但制止此種破壞反帝反封建革命勢力團結的趨勢，反而助張揚波促進國共分裂的鬥爭。結果竟遂演成十五年三月廿日中山體前事變。分裂的變流遂日趨擴大。

十五年十月北伐軍克復武漢，共產黨所謂聯席會議，武漢中央為國民政府，均在共產黨力扶持之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始由留阻兩員的國民黨中央負責同志，共赴南京，另組國民政府，但至四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即下令清黨了。

清黨事件，在國民黨前立場，是不應不有的舉動。蓋國民黨亡，中國的政治重心也隨而損失。但立

在民族革命的立場，革命勢力的分裂，即所謂「兄弟鬩牆」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但這種事的責任，學

情而論，共產黨確是極其負責的。這一分裂，却預伏下決一戰不變的外侮了。

蕭伯已說過，中國的革命勢力，不應基於馬克斯主義哲學的內在矛盾，而應該落於民生哲學的內在合作。惟有內在的合作，始能打破壓迫中蘇民族的侵略主義。但合作必須有共同承認的一個中心，那必須有被為中心的「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其他一切的主義，政黨或領袖，縱不離立即融化的會前為一，也應該改變力法則圍繞着這個中心的勢力而存在。我們若考慮這一時代的共產的行爲，他們在在的均是以破壞這個中心的革命勢力為目的，並欲造成自我的中心主義。這樣一來，他們仍舊有熱於那內在矛盾的泥淖裏。

蕭伯可說當時國民政府有些黨員，因為受了共產黨的宣傳壓力，他們竟失去了自信。除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前途總不免「的的」不道一評以外，如徐謙那演說思波斯爾左派也者，他們也好像舉動上了時道。他們的心戶總不相信國父的主張，是中國四千餘年的傳統文化與世界各國的科學思想的結晶，總不相信國父的崇高偉大，是超越於馬克思列寧之上，總不相信他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是規定民族獨立與世界華福的真正基礎。自信神一消失，對於國民黨的神聖工作，他也就感覺了來。甚至於他對國民黨的前途實分子也降和共黨的主張加以壓迫。所以他們無法理解國民革命而達世界革命的金科玉律，他們總不

實以中國爲本位，而偏要於中國之外去尋求世界。我們公正的說這些國民黨員，也是幫助那些目光短淺，輕躁狂妄的共黨分子的一極大助力。所以他們也不能不負釀成清遠的不幸事件의 相當責任。謝爾近二十年的歷史，這實在是現在中國各派派的分子應該引爲警惕的了。

有些人說，一個政黨，都是有排他性；統一性與支配性的，這句話立在黨派的觀點上，原也有牠的道理。但立在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觀點的卜，那個中心的黨的統一性與支配性固有絕對的必要，而排他性却應該以不引起分裂而破壞團結爲範圍。我承認一個政黨不能不爲其自身而求發展，但與小黨內的政黨，牠的發展，是建築在民族勢力發展的基礎上，換言之，即民族有了發展，牠內部的政黨也才能夠發展。羊毛是隨羊身的成長而成長的，「世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民黨若成功，無論排他性政黨或民族性的政黨，都有前途，國民革命若失敗，在最後的堪察加來爭奪的領導權或政權，那就是在羊身尖裏的相互齟齬而已！不幸共產黨歷年來的行動，卻實在如此！

一般人常說精誠團結，是見團結必須精誠，共產黨談戰略及策略，這些技術對於敵人當然非常必要，如妄行施之於黨中革命勢力戰鬥的內部，必然會引起許多猜疑。

戴季陶先生在他國是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針對當時共產黨黨員的行動，這樣說道：

「革命事業是一犧牲自己來救國救民的大事業，一定是要至誠一貫，心口如一，才可以做得成功。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要老實做信奉三民主義，老實是以國民革命為目的，心裏想的，口上說的，手上作的，都要一樣，才可以取得國民的同情，集合國民的力量。如某心裏想的是共產革命，口裏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是國民革命，讓一般國民看不出其真偽，說不清需要，共產的條件，既不因空想而具備，國民革命又因此生出許多障礙，到困難發生的時候，只用一句『排反革命』的空話來掩護真實的主義問題，思想問題，這樣作法那裏服得大眾，更那裏可以救得中國？要曉得在二十年的長日月當中……三民主義的必要，和國民革命的必要，這是空間和時間的真實性，你們大家爲甚麼不把C.P.C.Y的名義拿出來，還不至因爲時代不需要嗎？既然因爲時代不需要，却又不肯實心實意作時代需要的工作，豈不自相矛盾。」

這一節話我以爲是站在國家民族來說的老實話，這雖是十八年前所說的，然而不幸竟還有現實的意義。

九 土地革命的理論及其結果

清黨以後，共產黨客觀的時代背景所限制，尚不敢公然將共產的名義提出，仍想以國民黨作護符。八月一日南昌暴動猶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這些委員當中，差不多都是共產的要人，如林祖涵、吳玉章、李立三、譚代英、周恩來、張國燾、程潛、葉挺等，他們主要任務就是所謂土地革命。關於共產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批評很多，對於他們的土地政策，有認為係抄自馬列主義的，也有認為係黨智馬列的教訓的，只要各持一說。可是中共政策之是否遵循馬列主義，這他們的宗派問題，中國民衆尙可不必深究。我們要檢討的却在此種政策的實施，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究竟如何？這倒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我國爲一次殖民地的國家，一方面因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使原來有足自給的經濟漸被破壞，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另一方面，封建殘餘在農村尙有不少勢力，故我國現在的土壤關係至爲複雜而亟待解決。分配上，土地雖不集中而缺乏土地的農民甚多，佃租上，雖大地主極少而中小地主對佃農的剝削特重。論經營，荒地雖多却多於自地經營。即此數點，已足證明我國目前的土地關係，已不能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荒地加大生產縮小，農村普遍破產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中國土地問題之急待解決，這是誰都可以想到的。

南昌暴動到八七會議，瞿秋白繼陳獨秀而登台，共黨才自己出面了。這一時期他們的土地革命，原形遂從着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的規定，這規定是：

「……雖然取消繳納豪富之地租，重新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的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盤剝的債務，大減賦稅，謀得擁護派於富豪之家等等。」

這時期共黨即本此決議，在鄉村中大肆暴動，所謂湖南的秋收暴動及海陸豐暴動，即於此時發生。

這種土地革命，現在我們且不管牠是否合乎馬列主義，也暫且不必以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的政策爲標準而論其得失，現在我們且來看他們在實際施行上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和結果？其結果又與國家民族之所以遭受日寇侵略的原因有何關係？查共黨這時的土地革命，其表現於事實上的可以分爲沒收土地平分土地與查田運動三點。

所謂土地無償沒收，是共黨土地革命主要內容之一，也是他們實行時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他們沒收土地並無一定辦法，有時僅沒收一部份的土地，即森林、地主、大私有者的土地，與祠堂、廟宇公堂、會社的土地，以及他們所謂反革命的組織（A B團，社會民主黨）的富豪的土地。（見蘇聯沒收和

分配土地條例）但有時又主張將一切土地沒收，所有田地，不論水田旱田，均一律沒收，歸公推地處理分配與農民使用，（見閩西·地法令）各地沒收辦法如此不一。而且他們的沒收土地，係以階級爲標準，因農村階級分化不明，往往地主田地並未沒收，反而被沒收的，竟爲中農，甚至於貧農的土地。（見毛澤東在二次代表大會報告）可見共產沒收工作無一定路線與辦法，循環捕風，擾攘不已，並不解決土地問題。

所謂平分土地，也是共黨的主要口號，但共黨的基本主張：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必須廢除土地私有，土地平分，不但不能廢除土地私有，經過相當時期，又勢必要產生富農和地主的。而且土地平分，必使土地經營的面積更加分割，愈割愈小，土地經營必不易於改良，而令生產減少。況土地肥瘠不同性質亦異，決難做到平均分配。

至於查田運動，實爲沒收與分配政策的繼續，也是對於農民的反抗，特以查田運動希望此種反抗的消滅。最令人驚異的，根據他們土地部的報告，竟至有田十畝或十四畝，就已列在地主與富農的表冊上了。

共產黨實行土地革命的動機，依我看來，原也不一定是要壞的。中國農民的痛苦，論理誰不能不設法解

決，不遵他們的主張和辦法，却不免於經濟運動。他們將經濟改造的問題，看得如此單純，所以造成了
一個不可忽免的錯誤。這一次土地革命的結果怎樣呢？據我們所知道的。自然不外是荒地加多與生產縮
小。根據共產黨中央土地人民委員會統計，在江西豫區基本的二十餘縣中，荒地面積竟達到七十六萬餘担
（每四担合一畝）生產既大縮小，農民則唯一出路，必然祇有充當紅軍，或編為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
。所以農軍不死於刀兵，即死於飢寒，聚集此數千萬飢民，而毫無生活的出路，於是就有向鄰地鄰省挪
據，所謂紅軍也必須變為打家劫案的行爲了。

現在有數字可考的，單弋陽等六十一縣，財產損失達四萬四千萬元，被殺及逃亡的農民亦達二百
萬以上，被燒燬的房屋，亦有二十餘萬座。敵家人力物力的損失，爲了他們的土地革命，真令人觸目驚
心。在二百萬的被難者中，農民實佔有半數以上。這那裏是解放農民，實際不過是屠殺農民而已！

土地革命應該以發展生產解放農民爲目的，但他們眼着此種政策已行不通，於是遂將土地革命作爲
奪取政權的手段，分配土地變成買好農民利誘農民的策略。所以說：「在現在鬥爭的時候，發展生產不
是主要的任務，而爭取羣衆，才是迫切的要求。」（贛省行委會議決議案）又說：「當前的唯一問題，
是爲爭奪取廣大羣衆，克服敵人，取得革命勝利。這時候決定一切策略的標準，是爭取羣衆，而不是發

展作廢生產」。(陶西特委地席會議決議案)既然不致發展生產爲要務，那末糧食恐慌怎樣解決呢？當然是有兩部省抽奉，這還是「黨委員長所說的「以地誘人，引入內地」的手段了。

我們不滿意共產的土地革命，但並不是否認中國土地問題的嚴重而不急需解決。須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叛亂，均爲因於土地的分配不均。黃巢、張獻忠、李自成與洪秀全的焚殺劫擄，皆由於農民的生產發生問題。此次共產黨的突襲，其所以震驚延至若王宮區，事實上仍然是黃巢李閻的農民叛亂的直續，不過他們將此種叛亂穿上一件馬克思主義的大衣而成爲一種超階級的流寇罷了。現在共產黨已放棄土地革命，如果我們不切切實實施行中山先生平均地權及耕種權有同政策，仍然以等因奉此敷衍法令，疏忽歲月，將來禍患之是否再發，還是不能斷言的。我們應該知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同盟會的時候上，已經有平均地權的規定，甚至於在上李鴻章督時，都早已有了「地權其利」的建議了。今後的土地問題，大家儘不應再爲忽略。

十 暴動與盲動的區分

程秋岳既然以反對陳獨秀的議會主義而止戈，於是遂以暴動的姿態出現。廣昌暴動失敗後，接着就

的逆流，客觀上，實際不過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剝削權而已。他們的對敵既未認清，而他們的目的也不純潔。革命的目的，應該以國家民族爲其前提，奪取政權祇是實現救國家民族的一種手段。但使這種手段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衝突，必要時就應該將牠放棄。一個政權之需要政權，原爲實現其主義以救國家民族，設爲了奪取政權而引起內爭，誠使國家民族對外的力奇時，便應該顧全大局，一致對外。可見秋白等的路綫他們便以奪取政權的手段，竟視爲革命的唯一目的，救國家民族的目的，反放在不重要的第二位。這就是說，救國家民族不過是奪取政權的口號，或幌子，爲了奪取政權的目的才喊出救國家民族的口號，這樣的倒因爲果，故一切均演成黨派的自私自利。像這種不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的革命路綫，不論他們採取暴動的方式或採取和平的方式，其危害國家民族的盲動那都是同一的。

所以謂秋白等的罪惡，實在於他們沒有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和目的，並不在於暴動與否。如果對象認清，目的確定，暴動也並沒有什麼錯誤。譬如他們現在能夠於日寇統治下或南京僑組織下的區域，再來一次和羅秋白式的暴動，我以爲我們還應當特別歡迎，惜乎他們除襲擊友軍外，又不肯這樣做了。

十六年七月，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中，指責羅秋白爲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的行動，說「犯了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所謂玩弄暴動者，共黨專以暴動是否成功的條件爲標準，而不反省他們暴動的對象和組

的。和我們的看法不同：馬克斯主義者對於暴動，原視為一種藝術，並且認為是黨統治階級爭取政權時的直接一籌，應該帶着羣衆性，必然性，尤其要重客觀的條件。暴動是武裝的鬥爭，有決定勝敗存亡的作用；故必須十分的謹慎。這一次翟秋白指揮的暴動，每次均非常隨便，實爲無動不暴。「每一小部日常生活的鬥爭，都需要走到武裝的衝突」。(六大農民問題決議)自然這不是客觀條件的成熟，而是主觀人力的製造，這實「民粹派的英雄主義」。我們根據當時參加暴動者柳容的一個記錄，就可以證明。當他奉着共黨中央命令要在杭州負發動及指揮暴動而到杭州時，他說：

「(他)以爲至少杭州還有幾百個黨員，有幾千羣衆，但到杭州一調查，真正黨員連我包括在內，只剩了七個——杭州市委的七個吃黨費的人。黨費不僅沒有一個黨支部，連黨員也找不到一個。青年團也完全破碎了，大約還剩三四個人，黨和團湊起來勉強可以湊成十八，這樣的情形怎樣能暴動呢？……而省委却傳來一道命令，……：『我們必須在陰歷年前實行武裝暴動，建立浙江蘇維埃。』可憐我們拿什麼東西來暴動呀！我又寫信去申述不能暴動的苦衷。但是省委會派了一個入來，說非暴動不可，不暴動就是機會主義，就是違反黨的命令。當時我告訴他，叫我七個人怎樣暴動？他答復我很妙：『你們每人放一把火，七個人不就可以燒七幢房屋嗎？』(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這樣的不顧客觀條件的暴動，就是共產黨之所謂盲動。可見他們之所謂盲動，就是條件不夠時的妄動。共黨對於羅秋白所批評的盲動，不但不善於估計條件，因而不能變更政權，其實此種誤問手段，不問目的與對象的批評，我們實未敢回意。依他們的批評，假如羅秋白能估計條件，能在二三大都市，如廣東、南昌、長沙等處暴動或軍事上的進取均能成功，他們必定認爲非盲動了。但我們立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即使羅秋白能顧全條件而使暴動成功，這仍然是一種盲動。因爲這種成功，不過加強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內部的矛盾或分裂，仍不過加深內在的鋼鐵之禍，以趨於自殘的路線而已。至於國家民族有損無益。現在有些人均隨着共黨罵羅秋白爲盲動主義，不知共黨之所謂盲動，係單指其不能估計客觀條件而言，其實羅秋白估計客觀條件而暴動成功，如果不合於國家民族的請求或目的，仍然不能不是一種盲動，這倒與我們所應該注意。

十一 立三路線與九一八事變

民國十七年七月，羅秋白盲動失敗，被第三國際電調赴俄，總書記一席，由米夫物色。米夫向總書記委任。向孫節調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因學識太淺，一切事件均委託李立三辦理。所以當時爲權宜起見，

操於李並三之手。張慶霖白的鮮豔雖得與露六次大奇厚，露六次亦容且由布哈林親自出席。但對於當時由中國革命時局觀察，秋白並無不同。他洞謂中國革命運動仍是在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約時狀，並規定主要任務仍是最應積極地組織紅軍，渡收地主義。民國十九年李立三在「二二期」紅旗上也宣佈說：「現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在各省或幾省重要區域首先勝利。」他已經估計出那時有全國範圍的激烈的革命形勢，主張在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廣州、香港、大連實行武裝暴動。對於長沙、南昌、武漢則以軍事進攻。故立三路線不僅不是盲動主義的改正，而且上盲動主義的擴張。現在有些人批評秋白和立三路線，說他們都是中國的巴枯寧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這種批評，在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上，也不能說沒有理由。不過這些觀點說秋白與立三路線何以不是馬克斯主義，而是巴枯寧主義，有甚麼樣的說明即使非常正確，也還是不能真正的指出秋白李立三等錯誤。我們試問：假使露六兩次當時最能合乎馬克斯主義原則的領導，是否他們也就不錯呢？在中國國家民族的觀點上，以馬克斯主義為原則的路線，無論如何，祇能促進階級的對立，加強內在矛盾，減少國家的生產，造成民族的仇視，以致於使反帝的民族革命勢力崩潰。不論他們是馬克斯主義或巴枯寧主義，這些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祇階級應該一致合作的中國，兩者都根本不能成立。

李烈三真正握有共產黨的黨權，却在民國十八年。那時正是東北告警的時候，日寇已經虎視眈眈，利於我國的內亂。在中國革命的勢力正需要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時期，不料他們還要爭取所謂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使中共疲於奔命，應付維艱。他們將一黨一派的政權或利益，竟看爲超於國家民族的利益。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他們的真正錯誤，也就在此。

自他們割據江西竊建邊陲以後，在十八年秋季至十九年春季，立三路線迅速進行。彭德懷率八五兩軍渡湖北獨立師之手餘衆，竄擾湘東鄂西等處。時何應部隊在平江失利，彭遂乘勢攻陷長沙，及湘軍區突，彼始退出。是年一月朱毛率三千人由閩入贛，與黃公略軍會合，流竄贛南，更廣集散匪，復與彭會合於瀏陽。十月又犯長沙，因湘軍有備故不克攻下。

中央因紅軍的一再陷犯長沙，十九年冬即開始圍剿，以十八師張輝瓚部爲主力，但張聞紅軍內訌，僅於防範，又以採圍攻戰略，致兵力分散，不能築壘，遂爲紅軍所乘，被俘殞命。二十年六月，中央又命大員蒞贛，指揮軍事，因各軍聯絡久佳，故未能成功。嗣後中央乃徵調大軍，三次圍剿。因交通困難，糧食不易接濟，利在速戰。而紅軍則以堅壁清野的持久戰略，以困中央軍力，結果中央軍自退。三年之間，紅軍兩犯長沙，中央三次圍剿，民衆革命的核心勢力，終爲共黨內亂所消耗削弱。

抗侵略的戰線亦爲共黨的盲動所牽制擾亂，國家經濟上的物力財力，損失之大，難以數字統計。在共黨此種豆箕相煎的政策下，二十年九一八的東北事變，日寇遂得乘機提早發動了。

最爲親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的事，還要在九一八之後，當時國難嚴重，全國上下，都需要集中國力，團結禦侮，不料一二八滬淞之役，他們還要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又向熱州猛撲，威脅兩省各地，客觀上毫不管作了日寇侵略的策應。在全國人士看來，這已經失去革命立場而走到反動的方面去了。

立三路線的錯誤，實在仍是共黨基本路線的錯誤，共黨領導者的路線無論怎樣改變，但他們以內在矛盾爲原則的基本路線，仍然是一貫而不變的，不過立三路線雖然錯誤，但與共產國際那樣的批評，我們也並不十分同意。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長米夫說，立三路線之所以錯誤，是由於牠與國際路線相對立，這樣的批評，依我們看來實未免有欠公平，就是站在共黨方面，也有些說不過去。其實中國共產黨自陳獨秀離俄後，僅有的一點獨立性也一併失去了。羅秋白學立三的路線，事實上都是基於共產國際的訓令並且爲共產國際所直接指揮的。可是中國共產黨每一次的錯誤，共產國際均不自負其責，常讓其過失於中共的領導人，以爲掩飾。此次立三路線的失敗，米夫竟讓和國際路線相對立，這批評實不免有些抹煞事實。他們說立三對於革命力量是作了過份的估計，但十八年十月國際致中共的信裏，不也希望中共

實質人變了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等估計不足的傾向」嗎？他們攻擊李立三說不應該宣傳「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但其確切點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不是說過「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潮，已經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嗎？他們講立三不應作軍事冒險，但他們說中央的估計，「不但不與實際、福建、湖南、湖北的工農紅軍組織行動，互相配合，成爲全中國的農民羣衆的鬥爭」，「呢？這樣看來，立三談話又那裏與國際路線對立呢？我們不該爲立三叫屈。

總之自列寧逝世以後，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以光可憐日寇短視，那時他們不但不能助國民革命，在東北形勢日愈危殆的時候，他們還長命令中國共產黨加緊中國內部的鬥爭，而削弱抗日國民革命力量，這種錯誤的責任，大部份也應歸咎他們担負的。不知中國內部不特團結，即於聯聯的東方屬國也不見得有利。

十二 國際主義的認識

現在一談先提亞歷克白的主張主義，立三路線，不但在表，內裏自認爲其中常常指反其錯誤，即全賴本人對於他們國際行動而損害國家的力量，亦亦深致不滿，其理一俟如詳加分析，或成這種罪惡的實

在，他不能完全歸咎於瞿季廉。大部份的錯誤，如前章所述共產國際也不能辭其責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應為共產國際之支部，陳獨秀時代似乎還有幾分獨立性，對於共產國際的訓令有時還敢置以不決，自陳下台，共產黨遂為共產國際所支配了。

中共成立時，原由新青年社所改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周恩來的留法派，在當時的留俄派以及毛澤東等的湖南學生等各派所給組而成，故組織內早已具有矛盾。此後各欲擷取黨權，共產國際亦對於各派的鬥爭以使得以加強其控制。而蘇聯的消黨運動，也反映於中國的共產組織內，於是共產黨內部十餘年來紛相互傾軋，遂無法歸於統一。共產黨各次路線的檢討，骨子裏實為內部各派鬥爭，本沒有所謂是非，設真論其是非，有許多批判的理由，我們便無法解釋。例如六次代表大會認為羅秋白既非發動和犯了軍事的冒險行動，如果真是這樣的錯誤，則其後的立三路線，便應該加以改正，但是立三路線的冒險，實質上反駁秋白的領導更為擴大，竟由暴動更進而主張以紅軍攻略長沙，武漢了。論是非後者未必勝於前者，這是很難解釋的。又如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其本質亦未嘗不是促進內部團結，共產黨外侮，和毛澤東等的言論，可謂大同小異，在陳獨秀則被斥為機會右傾，而毛澤東便成為救國的光明大道，這又有什麼是非可說呢？從加入國民黨為出發點，繞了十餘年的一大圈子，又復歸於所謂「國共合作」，

是否十年前的中國革命性質與十年後的中國便已迥不相侔呢？此種派別的鬥爭，不過祇利於共產國際的掙扎，循環埋伏，結果，大家便都成爲共產國際所導演下的一齣提線戲而已！

所以盲動主義與軍事冒險的責任，實不能完全諉卸於瞿李兩人，公平的說，他們大部份的行動，皆先得共產國際的承諾，然後始敢有所作爲。後來秋白遭受處罰，立三調蘇拘禁，其實都不過是代人贖罪。

瞿李相繼下台，共產的領導權，已轉入於留俄派的秦邦憲陳紹禹等之手，他們提出的是國際路線。所謂國際路線，事實上就是想將中國共產黨百分之幾的獨立性，完全清除淨盡，一切行動都服從共產國際的意旨，激首激尾名符其實的變爲共產國際的一個副良工具。秦陳等握著黨權以後，他們與毛澤東的鬥爭又開始了，當毛澤東因被選爲蘇維埃中央主席，故秦陳等亟謀推翻毛的大權。此時中央軍已開始四次圍剿，毛根據其一二次圍剿經驗，主張用堅壁清野方法，封鎖消息，隱匿糧食，選擇中央軍的較弱省擊之。但周恩來則主張不待中央軍佈置完善，在蘇區以外，用各個擊破之法應付。國際代表問資助周的意見，故即採用周的策略。當有一派駐上杭的瞿明者，不知戰略已定，反對固守邊陲，秦等即借題發揮，以反對蘇聯路線爲辭，藉以反毛，於是發動反蘇聯路線的鬥爭，舉凡毛澤東所委派的人，盡被撤職。

「所有國權讓與俄國或蘇俄政府，皆完全放棄而去。」毛遂和張漢卿，專任蘇俄主席。到這時中共的國際主義路線的大功，才算告成了。

可是中共的國際主義路線雖告成功，而中國國家民族的解放前途，從此又多一層阻力。本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原非對立，而是相輔為用的，尤其是在世界革命的觀線上竟可以說革命的兩翼，失去其一，世界革命均必受其影響。不過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因時間空間的不同，不能不有主從之分，在蘇聯的無產階級職權中，以國際主義為主民族主義為副，原無不可。但在中國的對小民族職權中，我們便不能不以民族主義為主，而以國際主義為副。這一點列寧和中山先生在世時他們都認識得非常清白，故列寧曾嚴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對俄黨，共同完成國民革命，這就是以民族主義為主的鐵證。另一方面，中山先生生在歷次的講演中，雖勸同志等不要高談世界主義，但也並未反對世界主義，他的意思是通過民族主義才能達到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沒有成功，中華民族就沒有講世界主義的資格。他以苦力中彩的比喻，一再警告中國的革命青年，這種偉大的眼光，自從列寧逝世，共產國際的負責者，便不復有此種認識了。

中國共產黨自從蔣陳上台，國際路線成功以後，他們固然也高唱民族革命，惜乎他們不過以民族主義為手段，去達國際主義的任務為目的。將民族主義視為附屬於國際主義而存在，國際主義定全體，

民族主義成了部份，部份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衝突時，部份祇好犧牲。這種觀點，本來是蘇聯的立場，在蘇聯原是正確的，而中共自爲共產國際控制以後，他當然不能不以蘇聯的立場爲立場，所以他的行動，便無不和中國的國策相背馳，祇要合乎國際路線，即使犧牲中國，也在所不計。因而中國的抗日運動，中華民族神聖民族戰爭，在他們看來，都不過是以保衛蘇聯，保衛共產國際爲目的，民族革命反變成一種手段了。

十三 窮蹙歎悔悟歎

自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國軍遂進行四次及五次的圍剿，蔣委員長親自赴贛督師，先後收復贛昌，建寧，蘇區日愈縮小，紅軍主力，遂不能不於二十三年十一月上旬突圍西遁，經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青海而達於現在所謂的陝甘寧邊區，這就是他們自家的二萬五千里向長征。過去的蘇區遂完全爲國軍克復，這次戰役，可以說是共黨的一次轉捩點。同時日寇的侵略亦逐日擴大，在全國人心均有合力禦侮的要求下，共黨爲迎合全國的輿論，也不能不轉變了。

本來在共黨第六次大會中，所提出約十大政綱，其中第一第二兩項，已有推翻帝制主義統治的規定

所謂帝國主義，自然帝國主義也包括在內。九一八事變時，共產黨也未嘗沒有顯明的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目標了。即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保障中國的主權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一二八之後，他們雖一方面在江蘇發動攻勢，牽制中英軍，但在上海却發動宣傳，表示協助十九路軍。同年一月十日他們也曾經發表過通電，願意在三個條件之下即一、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二、保障民主權利三、武裝民眾，創立抗日義勇軍，同任何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所以宣傳上，我們承認他們也曾一再表示願意團結抗日，惜乎當時共產黨只注意經濟的宣傳，並沒有實際行動來證明他們的誠意，而共產黨又過於倚賴戰略與策略，不十分重視道德上的誠實信義，遂使國人疑為他的這種宣傳只是一種陰謀詭計不致十分相信，以致團結禦侮，終於未能成爲事實。

團結合作既未實現，在國民黨看來自然非安內便不能攘外，在共產黨看來，自然也祇有先掃蕩國民黨統治，才能自存，真可謂一機之差，全盤都錯，追溯到責任問題，黨綱不能不怪那些首先破壞列強與中山先生的相安政策，而謀奪取黨權政權的共產黨中的不良分子。

直到現在，這種的疑忌，也還存在於兩黨友誼的裂縫中，倘沒有方法可以使牠完全清除。此種歷史的教訓，實值得大家的猛省長思。所以今後國民黨員，我以為仍應堅持着中山先生的遺訓，對於那些

黨中的不良分子，不管怎樣不識大體，仍應以寬容態度來看他們的全黨。而共產黨員，也應該心口如一，在團結上，真正的表現出一些事實，以取信社會，萬不可全憑口說，再自欺欺人。果能這樣，國家前途便得到不少的裨益了。

二十四年夏季，日寇仍不以佔領長城以北爲滿足，又壓迫中國成立何梅協定，不但要求中國撤退駐平津憲兵軍隊，而且要取消黨部及政訓處一切組織，這便是所謂華北事變。民族的危險，發覺了全國朝野上下的人心，要求團結禦侮的呼聲，響徹海內，共產黨在這樣的輿情激盪中，乃於八月一日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其中這樣說道：

「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的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的行動，大家都應當有一兄弟團結於腦、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鬥爭。……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齟齬齟齬，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儘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

，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肩救國」。

這是共黨公開的正式的願意放棄對內鬥爭，團結禦侮的表示。如果這些話不是出於爭取黨衆的騙術，而確是發於救國的至誠，那便是民族革命中大家都應當共同遵守的鐵則，同時也是各黨各派行動應共守的基本原理。除這宣言外，他們還提出十大綱領，這些綱領都是現在已經實現，而毫無什麼疑問的。

有人說，共黨此次的轉變，實由於勢窮力蹙，特主張抗日，以便轉移國軍目標，停止進攻蘇區，而得到休息機會。因紅軍離贛間時，主力計九萬人，沿途爲國軍截擊，死傷逃亡，不計其數。道經青海，又爲回教徒巡擊，四方而軍幾乎全軍覆滅，及至陝北，部曲離心，老弱怨望，數不轉變，實已無法維持。當時會要求中央，依人敦收編，總額僅有一萬餘人，可見其實力已盡，故不得不以救國爲號召，而企圖再起。這樣的分析，依當時的情勢看來，這也許是共黨轉變的主要因素。不過一個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政黨要想牠完全放棄自己的利益，犧牲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也不是一切政黨都能如此。何況共黨是一個黨見最深的黨，祇要牠於顧全該黨自身利益之外，同時能兼顧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我們回想到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們反對帝國主義，還要以打倒國民黨爲條件，好像到民族的統治不

推測，而抗日便不可能。即現在張聞天在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還在說他們那時主張非常正確，從那樣的理想，能轉變到現在以團結爲抗日的唯一出路，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目的如何，除非他們還言不顧行，我總以爲這種態度，仍不失爲是一種進步而有希望的。

十四 光明的一頁

自二十四年的八一宣言發表以後，國共兩黨因受日寇侵略的刺激，已自意走上合作之路，二十五年，又發表「致中國國民黨」的一封信，在這封信內說道：

「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佈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聯區域即可成爲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織部份，蘇聯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任該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

這封信也提出要恢復 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綱，從這封信看來，雖然好有些人所謂是蘇聯力壓聯席出的碎聲，但也未嘗不可以表現他們對於統一團結已感到需要，由於家民族的觀點，總算是可喜的現

錄。

西安事變以後，共黨中央又發表一個給三中全會的電文，提出更進一步的保證，就是停止暴動，及土地革命，並願取消徐維埃及改組紅軍，兩黨的關係更趨接近。到八月廿五日朱德、彭德懷宣佈就第八路軍總指揮職，共黨中央復發表宣言，在宣言中，除上列各點外，加上一個現時流傳於全國人口的名言，就是：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所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第二日，蔣委員長也爲此宣言發表了準備談話。亦謂：

「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生命與生存。」

這兩篇重要的文件，真如宋慶齡女士所說：

「聽到這個消息，令人感動得幾乎下淚。」

這當然是中國革命史上光明的一頁。可是國共的團結，雖然成功，而大多數人仍不免有幾多疑慮與批評。有些人認爲共黨這次的自願合作，不過是一種欺騙或煙幕，在煙幕下，他們一定暗地裏操縱國民

黨的統治。又有些人說他們不過以合作爲一時的手段，等到相當時期之後，羽毛豐滿，他們又要揮花槍了。

此外還有人說，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爲了中國的國家民族，他們實際上是爲了蘇聯的保衛。

甚至於也有懷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或許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他以為民族騷擾與階級戰線，本來是絕對對立而不能融洽的。

這些疑慮與批評，究竟對與不對，這是需要事實才能證明。所以我們爲要檢證上面的話是否正確，又不能不觀察到合作以後，共黨的一切行動了。

然而我以爲無論如何，即使國共兩黨得到一個表面合作，對於國家民族總比較公開的衝突有益無損。即使兩黨的摩擦立刻尙不能免掉，我們仍應設法使他們迅速消除，不應當整針引線，使兩黨又陷於分裂的地位。

兩黨當中，尙不乏有遠見的人，不乏有識大體的人，今後究竟如何使中國的團結達到真正的精誠團結，我們仍應繼續努力。我不相信在日本寇加緊侵略的今日，各黨各派都有風雨同舟，存亡定共患難的

本頁。難道我們就沒有一種適當的解決方法，使中國的革命勢力，能始終如一的團結到底嗎？

十五 軍事行動與軍紀軍令

上面已經說過，一般人對於共黨這樣的大轉變，不免有許多的疑慮與批評，要判定這些疑慮與批評之是否正確，我們要檢查共黨抗戰後的一切行動才能斷定。可是很不幸的，共黨五年來的表現，其言論和行動，仍然是未能表裏如一，現在坊間出版的小冊，舉出他們許多破壞抗戰事件，我們雖然不能全信，但其中有些確鑿可惡的案件，也無法否認不是事實。我們固然不必還要再來敘述這些不幸的事件，可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爲了要設法使這些事件不再發生，似不能不公正的善意地提出來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要談到的便是軍事的摩擦問題。十八集團軍在國家軍隊的系統看來，既然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個單位，便不應該再有什麼特殊的或半獨立的性質，縱使牠的前身是由過去和國軍對立的紅軍改編而來，然而大家現在既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共同的目的，論理就應該彼此捐去恩怨，排除成見，一致的攜手來，把槍頭向着敵人，如果非要相互殘害，乘機取巧，無論是何方附聲，都不過是一種自殘而已。

譬如一殺人而痛心的圍攻張蔭梧事件，槍殺趙個事件，解決朱遠冰事件，以及孫仲文摘心而死的等等事件，據說張等之被解決，皆由於這些險伍至在和日這作犧牲的時候，寫十八集團軍乘隙夾攻，以致於全部崩潰。例如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張部在承德、深縣、藁城之間，正和敵入展開激戰，不料冀西突然以兩團兵力，向白馬莊張部民軍包圍攻擊，結果全被繳械，而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也被大批槍決。現在不談事實，即依毛澤東所談：「張蔭梧、秦啓榮是兩位摩擦專家，蔭梧在河北，啓榮在山東，簡直無法無天。向漢奸行爲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多……」雖然照他個所說，張等行爲確爲不當，無法無天，他們也應向統帥部請命，絕不能直接訴之軍事行動。如果別的那股反共回國事件，大家都可直接行動，那還他一個國家的軍隊嗎？張等雖然無法無天，難道他們也應照若張等無法無天嗎？張等是摩擦專家，難道所有被他們解決槍殺的一切人員都是些摩擦專家嗎？這種行爲，無論是非曲直，都是違反軍隊的紀律，此風是絕對不可長的。

尤其是新四軍的事件，更爲全國民衆所悲憤。此次事件的真相及經過，已見何白的暗電齊電。統帥部對於他們的委曲求全，亦可謂愛護備至。解決方案，規定以河北、察哈爾兩省及魯晉陝等省的一部，作爲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由中央撥給兩軍的軍械和餉項，真可說是不惜重資。『倘使他

們能「推發本領，撫躬循省，屏應虛席……不意公忘私之強，求追來陳律之功……一掃一彈，皆屬殺敵而施，同德同心，永絕藩籬之禍。」（齊電）「那豈不是國家民族之福。不料他們」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自涇縣向兩移，胆敢明目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爲敵作張，痛心疾首，莫此爲甚」。（軍委會通令）於第三戰區區司令長官才作緊急處置，將該軍全部解散。想來在華日報邊說：「千古奇冤，江南一葉，豈豆糜箕，相煎何急」。然而事實俱在，十六字的掩蓋，自然也無補爲力。蔣委員長說：

「就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襲擊友軍，佔領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予以解散。這「抗戰治叛的大經地義」。

「因爲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成功，就看我們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澈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的關鍵」。

蔣委員長這些話，的確是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來說的。一個國家的軍隊，其建軍的原則必須是絕對忠

一、不但不容有紛歧的組織，且不容有多系的軍令，否則便不能作戰，如果是對外戰爭，這個原則就更不能絲毫懷疑。過去中國之所以遭受數十年的外侮，就是由於國內軍閥軍隊的組織紛歧，軍令出於多門，國家軍隊既未統一，當然就沒有民族革命戰爭的資格，現在的國民革命軍，自黃埔建軍直到今日，能夠和優勢的日寇軍隊，作了四年的血戰，全因為有單一的組織和軍令。這一個軍隊的重要命脈的形成，也還是滿了無量數的血，付了無量數的犧牲所換得，假使將馬克斯主義內在矛盾的哲學，竟應用到國家的軍隊上來，那完全是一種叛國的行爲了。

共黨這幾年來，在軍事方面所表現的一切對內的摩擦，不能說不是一種極大的錯誤，無論爲了他們的光明前途或爲了國家的最後勝利，他們的確需要加一番的自我反省。

另一方面，共黨在四年來的抗戰功績，當然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譬如他們極力宣傳的平壤圍之戰與百團大戰，那勝利固然沒有像他們那樣過甚其辭的誇揚，可是也不能說他們沒有一些戰績。惜乎這些戰績的功，却抵償不了他們違法亂紀的罪。甚至於有些人說他們對於日寇的作戰，總是以保存實力爲原則，抱定贖錢就來，折本不歸的宗旨，假若真有這樣的話，我們總希望共黨中那些識大體有遠見的人，對於那些目光短淺，意見太深的領袖和黨員，應該迅速的殺法加以糾正。務使中國共產黨成爲一個真正

以國策民作爲前提的政策，也不枉費這十餘年來的奮鬥犧牲。

十六 邊區政權與團結一

抗戰以來，共產黨未嘗踐踏言的第二件事，便是繼續的保存邊區制度。所謂邊區，據他們說，那是抗日的根據地，是抗日軍部的出產地，是團結堅持領導抗戰的中心，但這些話印在一種政治上的宣傳，不能作爲一種法律的解釋，也不能作爲邊區制度能夠繼續存在的理由或根據。

按最初的邊區，原來祇有一處，即所陝甘寧邊區，但共產黨抗戰的機會，繼續的論論邊區內發展，更有所謂晉冀察邊區與冀魯豫邊區等等。這些邊區的由來，發生於二十四年共產黨鬧到陝北甘合之後所割據來的。西安事變前，他們所佔據者，僅僅有保安、安塞、神木、府谷數縣的一部份，西安事變發生到七七抗戰，共產黨乘機進兵，擴大範圍，後來增至二十餘縣。至於晉冀察邊區，據他們說，由於我主力由平漢線撤退，政權一時失却統馭，河北各縣，便以動員委員會、維持會、抗敵後援會、救國會、人民自衛會、縣行政委員會等等組織，建立起抗日的地方政權。實在晉冀察邊區，我們也可以認爲是陝甘冀邊區的向外的擴張而已。

這些變化的產生，究竟有無法律的地位呢？據共產黨的宣傳，說是經過中央承認過的，但卻沒有人看到過中央有這種明令的頒佈。以黨義憲法而言，他們便說這變化的政權，首先得得到司令長官的批准。接着又奉到中央的指示，而接受中央的法律與命令，這地方政府才正式成立，但這些話，無疑是杜撰的。依據中央管轄下的行政組織系統，由省政府而專員公署，以至於縣政府，所謂專區政府，既不似專員公署，因為它是在專員公署上的行政機構，但也不是省政府，因它的下面又多了一個政治主任公署，其組織、名稱及工作的方式都各不同，可見這種組織與中央的行政系統，迥然懸隔，實祇是地方割據的一種政權形式。過去共產黨曾取消蘇維埃與紅軍，紅軍雖改名，但不接受中央的命令，蘇維埃固已取消，可也，也不改變政權的組織，這顯然與他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相矛盾。既然說到統一，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就不容有兩種政權的行使，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政權是絕對單一的，不如，他的政令便不會貫徹而有力。一國三公，政出多頭，在平時已是天忌，何況還在戰時，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如反侵略的英美蘇與侵略者日德意，他們的國家裏，我們都找不到兩種不同的政權，假如連魯陝北各地，一縣竟有兩個縣長，那還「什麼民族統一」。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滅華政策，就在各地樹立中國的傀儡組織，將整個的中國主權使之分割

分化才好便於控制，假如統歸一內，也還要有所謂邊陲，那又怎樣與自異於這些他種政權呢？設有
人要認真共黨是在匪國際的一種赤色病毒，我想他們將無以自解。他們常常的說：「凡敵所不欲者我爲
之，敵所欲者我決不爲」，不知此種政權正「敵人之所欲爲者，所以便不應當令其存在了，此外若果我
們再就國防經濟的觀點來說，一切工業的建設，都應當以整個國家爲範圍而計劃起見，如果邊陲存在
政權各屬，國防經濟也必然要受到若干阻力。張君勱先生在致毛澤東一封公開的信中這樣說道：

「……各國之政黨，從無有佔領一特區以行其特殊政策者，以一國內准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
統，乃能成爲現代國家。……今吾國號稱統一，先生等亦以擁護國民政府自認於其中，而今則特區之
內，儼然自成一大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遇而效法先生等所爲，
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黨之若干政區，而國家非反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先生與其同志以打破割據相
號召，更豈取消特區之制，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

這種批評，確是立在國家民族大公無我的見解，語重心長，我們也以此希望於共產黨中的有識之
士。

現在共產黨常在強調着民主政治，若使他們無所聘教的民主政治而言，這一種民主政治便應實際行

一黨政治，中國的革命性質是民族革命，因血中國便祇許代表全體民族的民族政黨，即國民黨存在，其他所謂代表階級而黨派便以取消，共產黨，然不能例外，黨既不存，邊區也隨而不能存在了。假如所謂民主黨實際階級的民主，那末便應該像英美實行多黨政治，但多黨政治，也必須以統一的政權為前提，決沒有各黨有各黨的武力，各黨有各黨的地盤，所以現在的邊區也沒有理由可以根據。

就上面的分析，無論在法律上，統一一上以及民主政治的原理上，邊區的成立都是沒有理由可以辯護的。希望共產黨雖然僅僅實踐諾言，自腳撤銷邊區組織，將政權交還中央，俾我國得臻於真正統一之域，於國家民族前途實為莫大的裨益。

十七 以邊鈔代替偽鈔

共匪既佔有獨立狀態的邊區，既保有特殊編制的軍隊，因而在經濟方面，也形成一種分裂的形式，尤其是那經濟命脈的貨幣政策，對於國家金融的破壞，為積極。他們在晉察察區城自行設立邊區銀行，發行邊鈔。此種邊鈔既沒有實物担保，又沒有現金的準備，他們是以法幣來兌現的。這種以紙幣作為獨立的兌現制度，也可以算是奇異的發明。按當時共匪方面的宣傳，其政策完全是為抗拒偽鈔。由敵人

對貨幣寬鬆等時，也積極注意貨幣政策，成立銀行與發「假鈔」，如北平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察哈爾的「察南銀行」，綏遠的「蒙疆銀行」等，假鈔如紙銀券之類。此時敵偽政策的目的是，以偽發法幣，並阻撓法幣在以上各州流行。自共黨成立邊區銀行及發「邊鈔」以後，敵偽鈔票便遇有一種强有力的反抗。乍看起來，這種宣傳，未始也不無言之成理。可是我們把眼光放大一點，他們實行此種政策的結果，於國家整個的金匯政策，究竟是受益呢？抑仍受害呢？若我們詳細的分析，來，邊鈔的出現，既依賴於法幣，法幣的担保又依賴於外匯充足的準備基金。但外匯的準備金是有一定限度的，對在他們這「邊鈔」，事前既不經中央的核准，事後又不許中央的監督和稽查，還不是要使一定限度的外匯所担保的一定限度的法幣以外，又要另外的去担保若干數額的邊鈔嗎？這樣一來，他們便無形破壞了國家外匯的平衡，而使國家的準備金受到莫大的影響。像他們這樣無限制的發行「邊鈔」下去，這不過是自己搗亂自己的金融罷了。

事實上他們的發幣和敵偽的政策極其類似，敵人發法幣是禁止職屬人民行使法幣，他們也一樣的騙行禁止，而且禁得更為徹底。敵偽發行偽幣，吸收法幣，他們也是如此，而且他們還利用民衆運動來吸取私人的黃金白銀。兩者的性質完全一樣，所不同的，他們的手段較之敵偽更為高明。敵偽的政令，祇

及於都市，他們的力量已及於鄉村。敵偽的和平宣傳的宣傳，也不及他們那套救國衛國的頭人。真的，他們是更爲深入，更爲普遍。他們雖然將敵偽的偽鈔打了出去，但代替偽鈔的不是法幣而是惡鈔，雖然挫倒了敵偽對於法幣的套取，但他們却套法幣已有。他們的賬是得了勝利，但此種勝利，却不是國家民族的勝利，而是他們自己。不過偽鈔之害，其害祇及於幾個較大的都市；惡鈔之害，其害竟及於都市外的窮鄉僻壤，因他們所佔的地方大多是佔面的原故。他們時常在高呼着團結與統一但不做到金融上的團結與統一，那種團結統一實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形式罷了。

十八 教育文化政策的獨立

談到共黨的教育文化政策，當然也和他們一切政策一樣配合一致的。從他們在陝甘寧區或晉察冀區實施的教育設施與文化活動看來，顯然又已走向和中共分立的路線，種種舉動，都完全和中共教育系統脫離。教育的方針和內容，也全和中央全部對立的。

查晉察冀邊區的教育方針，其中雖主張建立正確的抗戰理論，發揚民族意識，但所謂正確理論，他們實際指的是馬列主義，民族意識，也祇是依據於馬列主義的解釋。假若中國革命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

議，那末他們以馬列主義的教育來從事宣傳，流弊所至，那即破壞中國的革命。我們雖然承認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並不是絕對的不相兼容，但兩主義的相容關係，却不是共產黨所說的兩個同時的階段，即現階曾且實行三民主義，待將來再實行馬列主義，這時的兩容，無疑的是一種歪曲，這錯誤已在新民主義的一章說過了。中國固然需要發揚民族意識，但發揚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是在民權民生的條件下進行，因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便不僅是一種新的民主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那就在民生主義。倘若民權主義的民生革命與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同時進行，那末，列主義便融化於三民主義之內，所謂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也就為三民主義的助惠去然而逐漸揚棄。他們所以一方面正進行着以階級統一為基本條件的神聖的民族戰爭，一方面他們又來宣傳以內在矛盾為中心原理的馬列主義，而且以馬列主義來教育一般純潔的青年，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時代的錯誤了。

尤其是在他們發揚民族意識的呼聲中，還有一種所謂拉丁化的文字運動，這更是一種不能解決的矛盾。此種拉丁化的文字，不但使我國已經統一的文字，分裂為各種不同的方言，而且對於我國民族文化所寄托的一切歷史的古籍，他們一點也不加以顧及，這那裏是發揚民族意識，這完全是對於民族精神的變滅，不知一個國家的獨立，也不能不賴某一種獨立的文字來支持的。

最近中共有所謂整頓三風的運動，這雖是一種整頓的作風的運動，但運動的浪潮，也漸漸波及於教育文化，所謂整風運動所揭發的三大目標，即是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三者中餘派主義完全屬於黨風外，反對主義則屬於學風，反對黨八股則屬於文風，兩項均關係於他們的文化教育問題。此次的整風運動，表面看來似乎中共的文化教育政策或者因此運動而有所改變，其實非僅祇要稍為分析，他們所改變的，仍不過是技術與策略，而其教育文化政策的本質絲毫也未變更。例如在學風上他們雖然高呼着反對主觀主義，實則所反對者，祇是技術上與策略上的主觀主義，至於在他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主觀的馬列主義，他們不但絲毫未改，反而以改進策略與技術為手段，機械的介紹到中國的客觀實際，究竟中國的客觀實際是否需要他們主觀上的馬列主義呢？自然他們並不過問。毛澤東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祇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插出來，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可是他自己便不問馬列主義能否從中國的客觀實際插了出來？而且向中國的客觀實際又能否得到證明呢？否則馬列主義便才長足他們的「觀主義」。他雖然反對中國馬列主義的理論家，死抱著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現成文獻，不肯熟視中國的客觀事實，可幸他仍以爲「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而「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去射中國革命之的。」究竟馬列主義之箭，是否係依照中國革命之

觀所經過出來，他故意不提，這就與於開戶造車，要用門合榫，那如何可言呢？中國革命之能，祇能用於中國革命所產生之箭，如果要將歐洲革命所之箭拿來應用，那當然不可，無的放矢固不可，有的放矢而不問其矢之如何，這當然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至於文風上之反黨八股，似已自己覺悟他們過去的一切文字，皆不免空話，言之無物。但我們以為文字的形式，常為文字的內容所決定，中共的文風今後能否脫掉黨八股的氣味，要看他否拋棄在中國實行馬列主義的政綱為否，如果他仍要站在馬列主義立場談中國革命，無論他如何想要脫離黨八股的氣味，而黨八股臭味依然是跟着他的。黨八股不過是主題主義的形式，不棄他們的主題的馬列主義的內容，又怎樣能脫離黨八股之形式呢？倘若不從根本解決，又要如毛澤，自己的八股所說，必然要『流毒全國，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十九 鴉片的販運種植

近來中共的政策，似乎越來越和中國的革命背道而馳了。最失去革命立場的政策，便要算鴉片的販運種植一事，其實中共販運鴉片，在抗戰開始的時候，早就開始地進行。邊區的鴉片，大部份是由省，和

等皆敵人任佐區內用錢收的方法輸入的，有時他們也化裝商人、大錢收買，一切押運等事，均由十八集團軍派隊負責，甚至延安再由「光華商店」和各地合作社銷售。當時每兩十二三元至十五元，每月運入邊區的烟土約共值五六十萬元。據確悉調查三十年十二月，由延安販運的烟土，一次即達八十五畝，每畝一百五十斤計一萬二千七百五十斤，或二十餘萬兩，運到後，除留三畝於偽專署所佔地的偽機關外，其餘均分運歸正、新、舊、停、赤水四縣領銷。中共出僱雜片，只收法幣，因為在敵區購入雜片，須用法幣，這一點也可以作為中共為什麼要在邊區禁止法幣流通的說明，法幣禁止後持有法幣者祇有兌光華券，於是他們便集中法幣，以為販運烟土之用，然而因這樣的政策，使流入敵廠的法幣每兩真不知要達到一個怎樣大的數字了。

販運雜片的人，並不限於奸商，事實上中共的部隊官兵，地方首長，都是販運的首腦分子。然而雜片的販運，次不及自行種之有利，所以中共由過去販運的階段，遂轉變為現在種植的階段，實行販運時期，他們也未嘗沒有種植，二十九年秋，就已在寧夏的鹽池和鹽東一帶，從事播種，自然當時尚未嘗遍，仍以販運為主，現在則注重種植，販運方面，已經不是販入而是販出了。

中共的確是種植，有它的整個計劃，自去冬起，就已在各縣剝地各區，如隴東區即為合水縣之平

定州，東華池，海廣河，臨北川，二家川等地，關中區，則爲淳耀縣之柳林，照金，經緯縣爲吳，葭南縣，三邊區爲定邊縣之張家畔，此外爲旗原鄂旗邊境一帶，都成爲主要的種煙區域。至於邊區政府直隸的陝北各縣，更當然，煙花遍地。以延安縣屬之臨鎮川而言，早在去年即已收穫，去年收穫較國公糧時，粟粟二斗就可折煙二斗。總之，中共的種煙政策，已經是證據確鑿，有目共睹，在他們的報章雜誌上，雖然方面掩飾，但已是閃閃見掩無可掩了。

現在一般人祇知敵碼在淪陷區中，大施其播毒政策，想戕害我民族的健康，應醒我人民的精神，銷沉我青年的壯志，吸收我社會的資金，然而不知素稱爲抗敵先鋒的，共，也和敵人的播毒政策趨向一致，無從從任何角度觀察，即使再應用辯證法的武器，也不特將他們此種錯誤導到一種掩護。

二十 解決共黨問題的匆議

以上各章，我從共黨的思想方面以及抗戰前後的行動方面，很客觀的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予以檢討，在這些檢討中，我們可以看出出共黨的思想和行動對於國家民族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種障礙。所以共黨問題之亟待解決，實爲全國人民所不應忽視，可是共黨問題究竟應當怎樣解決呢？

我們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共黨的產生，在中國實無客觀的根據。一個政黨的產生，都應該有一定的社會背景，無產階級的政黨，當然是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政團，但中共組織中的產業工人，實均極微小，如果這還可以稱為一個工人政黨，那就祇有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了。

中國之所以有共黨的組織，當然不是因為中國社會的高度工業化，也不是由於中國產業工人之有階級意識，其原因不過由於外在的共產國際的要求，與內在的智識分子的幻想而已。所謂共產國際，雖是國際性組織，其產生，實由於俄國革命之成功，其目的，祇在替俄國革命階級的力量，在鞏固俄國革命政權。俄國革命階級而成立之組織，自然與中國革命階級所發動的中國共產黨，自不能不以保持蘇聯的目的而存在了。中共既不是內在的產物，而是外在的刀工所創造，這就等於十餘年來的一切行動之所以在在和中國國家利益相反的原故。

現在有些人主張一黨的民主政治，這當然是一種思想，然而民主政治之於一黨政治或多黨政治，並無必然的關連，後者也並不前者為條件。一黨固可以，民主制度，而多黨政治也並不妨礙於民主制度的成立，即使共黨的組織，取消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也還是能夠形成。所以一黨祇許有一個政黨的專制可以是非相對的，然而一國祇許有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一個革命的對象，那便是絕對的了。

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組織的解散與否的問題，而是共產黨軍隊怎樣才能真正服從中央統帥部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全國人民怎樣監督共產黨行使她所許言的問題。一個軍隊不聽統帥部的指揮，時時與國軍衝突，並惡毒之割地盤，擴大實力，這在的現象在任何辯護理由之下都是不應當存在的。軍隊絕對不可用爲黨爭的工具，一切行動必須受政府的控制，真正民主的國家，黨見的鬥爭，應歸結於全國人民的投票，一黨政策的勝利，應依靠全國輿論的支持，這樣，才能使軍隊國家化，也唯有這樣，才能使國家軍隊成爲抗敵禦侮的真正武力。

有人說，共產黨近年來的一切非法行爲，由於他錯誤利用抗日鬥爭，以削弱國民黨，而且也想利用對外抗戰的機會，以擴張實力，但我以爲這種方法，很愚蠢的。國民黨如能努力於抗日戰爭，其結果必定越抗越強。絕非共產黨所能企及。倘若共產黨要非抗日鬥爭而自詡擴張，那不過給日本以漁人之利，國家覆亡，共產黨也祇有同歸於盡。

我以為共產黨現在積極發展已力，也許是一種防禦的性質，他們深恐一旦抗戰得了最後勝利，他們必難存在，故不得不預爲之計。然則共產黨前途，如果要靠他們的軍隊來保衛黨，這仍是一條死路。不知共產黨軍隊能發展，共產黨能在抗戰中發展，而且其發展一定比較他們迅速。抗戰勝利後，國軍仍然

有絕對的優勢，在此例率的發展下，共黨組織的保障，依靠軍隊，仍然非常無力。

中共既無階級的基礎，最好是自行解散爲宜，即使他們仍欲保衛他們自己的黨，最重要的仍將有僥倖與論和全國人民的公意。倘共黨迅速轉變他們對大地盤，消滅反軍的策略，本其初衷命第十八集團軍，絕對受中央統帥部的命令，表裏如一的做成一個抗日的先鋒隊，真正立下了若干功績，那必然會得到人民的誠意擁護，輿論的光明支持，果能如此，那時誰又能得而消滅他呢？

我以爲共黨將來的前途，祇有交還軍權及地方的特殊政權於中央，來換取合法的地位，一切活動，都以法律爲依據。政治主張應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發揮一個民主黨在野黨的精神。對於在野黨應採取善意的友愛態度，萬萬不可再從事自、自利的鬥爭，推諉相與，由抗戰建國的共信，逐漸獲得全國人民及國民黨的互信。大家攜手以共謀國是，這才是共黨永久不敗之基，這也即是全國人民對於共黨的公意，中共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國民黨有光榮的奮鬥歷史的黨，他的建立者孫先生已成爲中華民國的父，他的現在的領袖蔣委員長，不僅是全國一致擁戴的領袖和統帥，而且他是重建世界和平的世界偉大領袖之一。今後的國民黨，應繼續過去的精神奮發實踐，即言即行，選選優秀分子，充實下級幹部。選賢任能，改善地方行政

機關。大會吸收青年，予以適當之組織及訓練。尤其是有計劃的大量訓練各種幹部，闡揚三民主義。發動民衆，組織民衆，我想共黨的非法活動也就會無形消滅的。

在共黨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以前，全國人民應該一致的起來促進這一問題的解決。現在的目的，固不可太奢，但共黨自行公佈的領共合作宣言中的四點諾言，全國人民應使之實現。尤其第四點取消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更應使之真正受軍委會之統轄。一個政黨的諾言，決非兒戲，祇要共黨真能實踐諾言，在抗戰的過渡期間，也就於國家民族大有裨益了。

總之，現在的黨派問題，無論如何，人民要本其主人翁的地位，不應注視黨派問題而應注重軍紀問題，法律問題，人民對於一切政黨或軍隊，不問其黨不黨，而應問其法不法，不應問其是何種軍隊，而應問其是否遵守軍紀。我們固然不必一定做到全國祇要一個政黨，但却不能不做到全國祇要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法律與軍紀，這是絕對的，否則便不能成爲一個國家了。

這就是我們立在國家民族立場對於共黨問題解決的一個建議。

中英問題平議

七四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初版

中共問題平議

定價每冊三元

著作者

張鐵君

印行者

正論出版社

總經理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版權所有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三四八九號

573
11238
X
⑤

KBC
231
3/3